

哈姆莱特的性格和行动

阮 坤

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《哈姆莱特》深刻而多方面地描绘了丹麦王子的性格和行动,揭示了人道主义理想和无人道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,反映了时代本质,表现了作者对人类命运的关怀。这部作品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读者心中,激发起不同的感受和反响,有人慷慨悲歌,有人唏嘘叹息;对王子哈姆莱特的形象有人从某一个角度作出解释,有人又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评论。言人人殊,聚讼纷纭。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评述的基础上,对哈姆莱特的性格和行动的分析作一点批注式的补充。

—
先说哈姆莱特的性格。

悲剧开始时,王子从德国维滕堡大学回到丹麦宫廷参加父王的葬礼。莎士比亚没有花费笔墨描绘王子在大学读书期间的个性表现,而是让读者或观众去寻思。看到一幕二场,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印象:哈姆莱特在当时的人道主义思想中心维滕堡大学读书的时候,受着这一先进思潮的影响,对于人和世界上的事物,是怀着乐观的心情去看待的。他认为一切都很和谐,一切都充满活力。他怀着远大的理想和上进心,觉察不出理想和现实之间有什么矛盾。他问好友霍拉旭,为什么离开维滕堡,霍拉旭回答说:“无非是偷闲躲懒罢了。”王子当即表示极大的不满说:“我不愿听见你的仇敌说这样的话,你也不能用这种话刺痛我的耳朵。”王子还准备在参加了父王的葬礼以后,就“回到维滕堡去继续求

学。”这里没有用倒叙手法,却起着倒叙的作用,使我们能看出王子早期性格的特点,即他原先的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和积极的生活态度。事实上,他在以后的独白中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观点,都是在维滕堡大学时期形成的。但就在他回国不久,他的“天神”似的父王死去还不到两个月,他的母亲就“迫不及待地钻进了乱伦的衾被,”改嫁给丈夫的弟弟克劳狄斯,而这个乱伦的家伙还僭夺了王位,纵酒作乐。哈姆莱特面对这种丑恶的现实,痛不欲生。他以前的美好的憧憬,顿时烟消云散。等他见到父亲的亡魂,得知叔父是谋杀兄王的刽子手以后,他五内俱焚,怀着无限惨痛的心情,控诉人世间的罪恶。现实和理想是这样势不两立,他决心否定过去从书本上理解到的道德箴言。他发誓说:“我要从我的记忆的碑版上,拭去一切琐碎愚蠢的记录、一切书本上的格言、一切陈言套语、一切过去的印象、我的少年的阅历所留下的痕迹。”(一幕五场)一切都需要重新思考,重新作出判断。哈姆莱特的性格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。他的内心在进行剧烈的斗争,他长期处在矛盾痛苦之中。从悲剧开始一直到四幕三场,是哈姆莱特的性格发展的重要阶段。

到四幕四场,哈姆莱特看到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为了同波兰争夺一小块土地,“拚着血肉之躯,去向命运、死亡和危险挑战,”相形之下,哈姆莱特感到无地自容。于是他决定从这一刻起,“屏除一切的疑虑妄念,”为复仇除恶而奋战。五幕一场,他同掘墓人的谈话,表明他“看透了生命的无常”,以宿命论消除

不可知论所带来的恐惧，内心获得了平静。

以上所述是哈姆莱特性格发展的大致过程。别林斯基把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，即悲剧开始前的“幼稚的不自觉的和谐”、从悲剧开始至结尾的“失调和斗争”和最后“勇敢的自觉的和谐”。这里，后两个阶段在时间上的划分似不明确；说哈姆莱特最后进入了“勇敢的自觉的和谐”阶段，也未免过于“溢美”。应该指出，哈姆莱特最后举剑一击，刺死克劳迪斯，并不是预先计划好的，这样的复仇行动带有很大的偶然性。哈姆莱特在同雷欧提斯比剑前曾表示愿意尽力为克劳迪斯“博取一次胜利”，在刺死克劳迪斯后还说这是“一幕意外的惨变”。可见，用“勇敢的、自觉的和谐”来说明哈姆莱特最后阶段的性格特征，未必恰当。

我觉得，哈姆莱特性格发展的三个阶段，也许可以用“心花怒放”、“心乱如麻”和“心平气和”三句话来概括。“心花怒放”是指他在悲剧开始前即大学时期怀有乐观心情和凌云的壮志；“心乱如麻”是说他在为复仇作准备的过程中心事重重；“心平气和”说的是王子在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以宿命观点解除了顾虑，但对以克劳迪斯为代表的罪恶势力始终是怀着义愤的。

哈姆莱特的性格，究竟是坚强还是软弱，这是历来争论最多的问题。别林斯基在评论中特别强调哈姆莱特的坚强。他说：“哈姆莱特的本性是坚强的。他的辛辣的讥讽，他的突然迸发的激情，他同母亲谈话时的狂放的态度，对叔父的骄傲的鄙视和毫不掩饰的憎恨，所有这些都说明心灵的刚毅和伟大。”确实，剧中有些情节也可为“坚强”说作注脚，如王子的装疯、安排戏中戏、掉换国书置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腾于死地，都表明王子的性格是坚强的。歌德在评论时则把王子比作一个花瓶，形象地说明他的软弱。诗人这样指出：“这里是一颗橡树种在一个珍贵的只能在怀抱中承受娇花的瓶子里，树根伸出去，瓶子

就裂成了碎片。”是的，国内重大的变故在哈姆莱特心里掀起了一阵猛烈的风暴，使他精神上失去了平衡，长时间地犹豫不决。这就是“软弱”说立论的依据。

但不论是“坚强”说还是“软弱”说，都只能说明哈姆莱特的性格的一个方面。他的性格是坚强和软弱的矛盾统一体。“既刚且柔”，他的性格的复杂性就表现在这里。当哈姆莱特念念不忘复仇除恶，“全身每一根微细的血管都变得象狮子的筋骨一样坚硬”（一幕四场），要“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”（一幕五场）时，他是坚强的；但当他上下求索，对如何进行复仇心里没有一点底，因而迟迟不能付诸行动的时候，他是软弱的。坚强和软弱是他内心矛盾斗争的不同表现形式，相反而又相联。执着于一面谈论哈姆莱特的性格，都不是辩证地看问题。如果那样看的话，根据哈姆莱特自我检讨时一度想到自杀（一幕二场），后来又想到“命运的暴虐的毒箭”而流露出恐惧心理（三幕一场），就得认为他的性格是怯懦的了。那显然是失于偏颇的。

重要的问题在于：莎士比亚不是要把哈姆莱特写成一个刚毅坚强的人物，也无意为他勾勒一个苍白软弱的脸谱，而是用浓墨重笔把他描绘为一个忧心忡忡的、既关心个人复仇又放眼于时代大事、乾坤大业的形象，也就是要着力刻划王子的耽于审慎思维的忧郁性格。剧本一再告诉我们，王子为人世间这个“荒芜不治的花园，长满了恶毒的莠草”（一幕二场）而忧虑，为“丹麦是一所牢狱”而忧虑（二幕二场），为“负载万物的大地”变成了“不毛的荒岬”，“复盖众生的苍穹”变成了“一大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”而忧虑。马克思曾经指出，如果把哈姆莱特的性格简单化，那就“不仅失掉了王子的忧郁，而且连王子本身也失掉了。”

从悲剧全部情节看来，王子的个性是内向的，深沉的。他的性格的主要特征是忧郁和审慎持重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“决心的赤

热的光彩，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”。（三幕一场）他的行动，也罩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。

二、

现在就来看看他的行动。

上面谈到哈姆莱特的装疯，安排戏中戏，掉换国书等行动，都是他性格坚强的表现。他装出“恋爱不遂的疯狂”，使得克劳迪斯惴惴不安，急忙采取恶毒的反装疯的对策，这从反面证明了哈姆莱特的威慑力量。他要装疯，就得忍痛割断同奥菲莉亚的情丝，这也需要极大的克制力。此外，他在同母亲谈话时一剑刺死躲在帷幕后面偷听的波洛涅斯，斩钉截铁，干净利落，也足以说明他行动上的果断。但这只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方面。评价他的行动，必须全面地进行考察。

从剧本中我们看到，哈姆莱特曾三次检讨，两度犹豫。检讨一次，迟疑一次，迟疑一次之后，又来一次检讨。二幕二场，他听戏子唱戏，唱得有声有色，深有感触，觉得自己是一个“不中用的奴才”，责备自己是“一个糊涂颓废的家伙”，忘记了复仇，是“一个逆来顺受的怯汉”，这是第一次检讨；紧接着在三幕一场，他再次检讨自己行动上踌躇不决，说“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”，应该使伟大的事业具有“行动的意义”。到四幕四场，他又作了第三次检讨，痛感自己因循隐忍，“只是大言不惭地说‘这件事需要作’，可是始终不曾在行动上表现出来”，表示要赶快完成“蹉跎未就的复仇大愿”。

哈姆莱特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自我剖析，自我谴责，得出了什么结论呢？他在最后一次检讨中分析了“三分懦怯一分智慧的过于审慎的顾虑”，认为“真正的伟大不是轻举妄动”。这句话似乎可以看作他对自己行动上的延宕所作的解释。

恩格斯曾经把法国的空想共产主义者——布朗基主义者比作哈姆莱特，指出“无论

哈姆莱特说过多少次要有毅力，但是，哈姆莱特始终是哈姆莱特”。恩格斯在批评爱德华·伯恩施坦迟迟不去伦敦，不去了解他需要了解的一切时，说他是“世界上最不可救药的哈姆莱特”。显然，恩格斯在对哈姆莱特的评价中，都强调了他的优柔寡断、迟疑犹豫的一面。

哈姆莱特两度犹豫（指关键时刻的犹豫），是在戏中戏《贡札古之死》演出之后。克劳迪斯看了戏，作贼心虚，神色不安，不等闭幕就仓皇离开了剧场。哈姆莱特掌握了这个情况，父亲亡魂的话得到了证实。时机号召他举起复仇之剑。照说王子现在应该坚决行动起来，“痛饮热腾腾的鲜血，干那白昼所不敢正视的残忍的行为”，可是王子犹豫了，他还要到他母亲那儿去一趟，顾全“天性之情”。复仇的事暂时搁在一边了。过了一会，当他叔父正在祈祷上帝为自己赎罪的时候，王子有机会“正好动手”，可是他拔剑出鞘，欲杀又止。他说：“不，那还要考虑一下”。对于这样的考虑，是否可以说“一失误成千古恨”呢？

哈姆莱特行动上的延宕，正是这种考虑施加影响的结果。但他的考虑不是没有理由的。

哈姆莱特推己及人，思绪万千，真可说是“心事浩茫连广宇”。他日思夜想的不仅是个人复仇的问题，而且是除恶济世的问题。他在慨叹“时代脱了榫”之后，认为自己应该挑起重整乾坤的重担。他说：“真可恼，偏是我生来要把它整好。”（一幕五场）他的一生是思考、探索如何整好脱了榫的时代的一生。个人复仇是不难实现的，除恶济世却不是一蹴可就的事。任重道远，应该深思熟虑。

哈姆莱特要开展除恶济世的斗争，就必须对社会生活进行周密的观察，看清人世善恶的本来面目，这就需要时间。悲剧第三幕有三处提到“镜子”，看来不是偶然的。第一场里，奥菲莉亚说哈姆莱特是“时流的明镜”；

第二场里,哈姆莱特谈到戏剧的目的是“作为映照大自然的一面镜子”;到第四场,哈姆莱特又对母亲说:“我要把一面镜子放在你的面前,让你看一看你自己的灵魂”。莎士比亚的剧本和剧本中的主人公都是镜子。这镜子要映照大自然,即社会生活,这镜子要照出人的灵魂,照出人的灵魂中的卑鄙龌龊的东西。

哈姆莱特安排演戏,就是给叔父照镜子,在一旁窥察他的神色,“探视到他的灵魂的深处”,以得到切实的证据,确定父亲亡魂的话的可信程度,并进一步使叔父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供认他的恶行,从而义正词严地公开宣布他的死罪。

哈姆莱特的形象体现了人道主义者的伦理道德观念,立身行事,务求光明正大。哈姆莱特对母亲的态度是:“无论在言语上给她多么严厉的谴责,在行动上却要做得丝毫不让人家指摘”。(三幕二场)对国王的态度也是这样。卑鄙的暗杀手段是哈姆莱特所不齿的。

莎士比亚任何时候都坚持人道主义原则,任何时候都主张行动要有节制,任何时候都要求调整理智和感情。哈姆莱特就是照

这个模子塑成的。莎士比亚不让他象雷欧提斯那样发动群众起来暴动,就是唯恐“推翻了一切的传统和习惯”,唯恐破坏了和谐。哈姆莱特告诫戏子“一切动作都要温文”,“不能越过自然的常道”(三幕二场),他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。但由于温文节制,过于审慎,毕竟贻误了行动。他说:“我们应该承认,有时候一时孟浪,往往反而可以做出一些为我们的深谋密虑所做不成功的事”。(五幕二场)这就是他从正反两面做出的行动总结。

归纳起来说,哈姆莱特在行动上既孟浪,又稳重。前者的表现似旋风,持续的时间短;后者的表现似阴霾天气,持续的时间长。孟浪得及时,不失为坚决果敢;稳重得过度,就优柔寡断。当他完全受激情支配的时候,他是坚决果敢的;当他过于审慎地进行思维的时候,或者当他的理智和感情调整得不适当的时候,他是优柔寡断的。哈姆莱特临终时,要霍拉旭传述他的故事,让世人明白他进行斗争的真相,似乎还想劝告人们总结行动延宕的教训。悲剧结尾蕴蓄着激越的展望,振聋发聩,尽在不言中。